



余世磊，现供职于太湖县文化旅游体育局，著有散文集及学术专著十余本。

那应该是1980年代，还清楚地记得那个黄昏，白亮的天光，如水一样，从乡下老屋中的天井里倾泻下来。那天光由白亮逐渐变为浅灰、淡蓝、深蓝。少年的我，坐在自家的门槛上，忽然莫名其妙地想到：到了2000年，我会是怎样？想象中的2000年，是多么遥远而缥缈！

想不到，2000年那么快就到了，且已早成为渐行渐远的过往；想不到，由此开始，人生中会有那些无奈、伤痛！

应该说，2000年前我的人生是平坦的、顺利的。大约在A单位待久了，便会生出些单调、厌倦来，其时霉运的阴影开始笼罩。2002年，有个升职的机会，便换到B单位。由于一些不可说的原因，在B单位，频繁的出差，繁忙的工作，几乎顾不到家庭。让我悲摧的是，许多事都毫无意义，简直是浪费生命；无形的压力，

让我身感疲惫，特别不愉快。

一位同事告诉我，这样下去，迟早要出事。乡下的老娘给我算命，说我将进入不是一般的恶运，我自然不信算命，但还就被说中了。2006年6月，我们一行因公出差，在河北省遭遇一场重大车祸。我被拉到沧州二院，先做脾脏切除手术，待伤口缝合，又做一次髌骨固定术。在医院住院近两个月，身上伤痕累累，吃尽千辛万苦。

我霉，沾着我的人似乎都霉。我两个表兄千里迢迢从家乡赶到沧州护理我，一个人的钱在火车上被偷了，一个人的钱在医院被偷了。好不容易等到出院，请家乡中医院派一辆救护车送我回家，那辆车没出过任何事，但那天载着我，在徐州收费站停车等候交费时，偶遇前面一辆大货车后倒，我眼睁睁看着大货车车尾撞到我们的车头，把前挡风玻

十年之霉

余世磊

璃全部撞破，万幸人没事儿。

回到家乡，再住院两月。出院后的我，必须拄着双拐走路。其间，为了医疗费等善后问题，少不了与人磨嘴皮，搞得人生狗熟，倍感伤心，由此也得罪了人，又不愿低头迁就，便下决心离开B单位。找组织，明确提出要求，希望看在工伤的份上，能安排一个稍轻闲的差事。可最后的结果是，组织没和我做任何通气，一纸公文把我调到一个我最不愿意去的C单位当负责人。彼时年轻，书生意气，我不惜以个人前途作抵抗，硬是废了组织那一纸文件。

最后将我调到现在的D单位，基本上是赋闲。对我来说，历经一场生死，不能说大彻大悟，也算看透了一些事。好在还能够学学古人，“乐圣且衔杯”。面对这些，心还是很平静的，且乐得一份轻闲自在，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，生活倒也过得忙碌而充实。这是2008年，我38岁。

自己刚刚从那场变故里走出来，父亲又因为一件说不清的事情，摊上一场官司。那事儿，我以为，用艺术的虚构也编不出来，但实实在在就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。那段日

子，累累若丧家之犬，到处求人，说明情况。好在得到一些领导及社会人士的同情和帮助，这场官司最终化解，我也是筋疲力尽。想起鲁迅的诗：“运交华盖欲何求，未敢翻身已碰头。破帽遮颜过闹市，漏船载酒泛中流……”觉得是自己再生动不过的写照。而年轻时读这首诗，又怎能解得这诗中的况味？

直到2010年，这霉运似乎走到头了。在C单位又平平安安地过完11年，对我来说，感谢生活，很好。现在回首那十年的经历，说实话，我心中并没有多少抱怨，相反，我还要感谢它，磨砺了我的身心，让我尝到各种人生滋味。

我觉得，人生不是一条平线，而是一条波线，有高峰，也会有低谷。走到高峰，不必得意，接下来可能要走下坡了；沉入低谷，也莫悲伤，接下来又会慢慢地走到高处。每遇亲友遭遇不幸，我总是以这样的话作为劝慰。

已过知天命之年了。唯觉有点悲哀的是，刚刚把人生活出了一点眉目，品尝到一点味道，可是这人啊，已经老了！



三次看世界

江露露

这十年，我曾三次看向世界。

第一次，是2011年，我正好大学毕业。

我生于80年代末，在我还什么都没干的时候，我和我这一代人便被人们称作“垮掉的一代”，这些“人们”可能是学者、专家，也可能什么身份都不是，总之是我们的前辈，总之他们把标签呼啦啦贴向了我们的，仿佛我们生来就是为拉垮属于他们的伟大世界。

或许没错，我们自小都被照顾得很好，所以毕业就意味着我们离开了最后的天堂，或者说，来到了他们的世界：

我仍然记得，实习中那个胖胖的老板叼着烟，扣下我们本就不多的工资，用胖到发肿的手指戳着那个研究生刚毕业的女孩子让我们都滚；

我仍然记得，在乐购商超门口，那些穿着人模人样的男男女女，光明正大地向刚毕业的学生套路传销组织；

我仍然记得，我被拉着去合肥看房听他们讨论哪些楼盘升值更快后，在自己出租屋中因为水电费费和合租的陌生女同学心生嫌隙；

……

这是一段伤筋动骨的磨合过程，那时候毕业生年年创新高，“就业难”的问题一直在被破解；房价在一波接一波的调控中一次又一次创下新高；我们在经济形势最难的一年后，又迎来了最难的一年、最难的一年，峨眉山有人跳崖，自如的出租房里有人得了癌症，路上的快递小哥抱着交警痛哭流涕……

我们都是同类。

但好在，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填充进这个世界，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某些平衡点，为此还诞生了很多新鲜且生动的词汇和短语，比如，“996是福报”“内卷”“人间不值得”……

痛苦的、快乐的，厌恶着、向往着，我们和这个世界戏谑性地共生着。

第二次，是2012年，我入行了，成为了和这座城市同呼吸共命运的新闻人。

出离年轻人略显狭隘且愤怒的视角，我看到了更多更复杂的人：防艾日，我坐在一间同性恋的出租屋里，听很高很帅的他温和地说自己忤逆了父母，说自己得了癌症时日无多；在迎宾小区，那个四五十岁的阿姨“扑通”一声跪在我面前，让我帮她要还建房；那个头发雪白的老奶奶，在达成所有诉求签字同意后，在搬迁



江露露，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。

现场仍然以头撞墙要涨价……

在这些人之外，我还看到了更加宽广的世界：我知道路是怎么修通的，桥是怎么架起来的，街头的烟蒂是怎么被捡起来的，那些女孩子是怎么重新走到学校的，水是怎么重新变清的，李江玲烈士是为什么牺牲的……

何其有幸，我领略过他们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。我离这些向善向上的力量如此之近，我怎敢辜负这个滚滚向前的时代。

第三次，是2016年，我的孩子出生了。

因为她，我开启了人生的新世界：我第一次知道把脚埋在沙子里的感觉，第一次知道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感觉，第一次知道蹲在商场里看人来人往的感觉，也是第一次知道作为人类如何谦卑而自由地和动物、植物们平等相处。

她带着我，重新成长，温柔地、慢慢地。

也是因为她，我从未如此热爱这个世界。

后来，我们遇到了新冠肺炎爆发。一时之间，世界慌乱无比，声音也嘈杂无比，于是那个当时风头无两的女作家说“时代中的一粒灰，落在个人头上，就是一座山，而我们偏偏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之中”，竟引人转载无数。

我却记得，停了工作的父亲站在窗前，看着疫情防控人员临时搭起的24小时值班点，跟我感慨：“你们赶上好时候了，要在我小时候，那人要死得像稻把田一样。”

父亲比那个女作家懂——是这个时代为我们抵挡了风霜。

再看看我孩子，我要交给她一个怎样的世界？

我必须得做点什么，让自己更好一点、再好一点，让这个世界更好一点、再好一点，好到可以为她和他们这一代抵挡所有的风霜。